

漢 武
新 聞
史 料

第 六 輯



长江日报新闻研究室

目 录

· 建国后新闻事业 ·

- 党对《大刚报》的改造 陆天虹 (1)
- 武汉新闻摄影事业的发展 赵彦章 (16)
- 新华社在武汉机构的变迁 孙鸿斌 (43)
- 解放初期新华社湖北分社的情况
——雷行同志给本报新闻研究室的信 (49)
- 武汉新闻电讯的改进 孙守鹏 (51)
- 报纸的群众工作 邵可晴 (53)

· 报刊研究 ·

- 向警予和她主编的《大江报》 刘茂舒 (63)
- 抗战时期的《大公报》
——纪念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4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
讨论会论文 李纯青 (73)
- 全民抗战的号角
——《全民抗战》在武汉 吴德华 (96)

· 新闻业史 ·

- 汉口的外文报纸 舒宗侨 (104)
- 武汉沦陷时期报刊梗概 萧海涵 (107)

- | | |
|----------------|-----------|
| 汉口《时代日报》 | 谌仲入 (111) |
| 采写武大“六一”惨案的经过 | 黄小野 (113) |
| 汉口编辑人协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 邓式中 (116) |

· 回 忆 录 ·

- | | |
|-------------|-----------|
| 回忆《新青年报》二三事 | 吴笛生 (119) |
|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 |
| ——回忆在新湖北日报 | |
| 华中日报的日子里 | 李育仁 (125) |
| 汉口新闻界内幕点滴回忆 | 袁 元 (137) |

· 新闻界人物 ·

- | | |
|----------------|-----------|
| 忆先父宛思演 | 宛斗生 (146) |
| 一个爱国主义者走过的曲折道路 | |
| ——我所知道的前大刚报社长 | |
| 毛健吾 | 欧阳柏 (151) |
| 执着地追求 光荣的归宿 | |
| ——怀念老报人严问天同志 | 黄邦和 (163) |

· 资 料 ·

- | | |
|-------------------|-------------|
| 五四时期刊物《新声》内容简介 | 张克明供稿 (169) |
| 北洋政府湖北省长与内务总长关于订定 | |
| 《取缔白话报小报及通讯社规则》 | |
| 往来咨文 | 张克明供稿 (173) |

党对《大刚报》的改造

陆天虹

武汉解放后，所有旧的报刊、通讯社都停办了，唯有汉口《大刚报》仍继续出版，并且置于武汉军管会文教部领导之下，以后又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直接领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同《大刚报》在解放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以及报社多数工作人员的政治倾向是密切有关的。党对《大刚报》的历史和它的政治表现是有正确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熊复同志在1949年12月9日为《大刚报》的题词中说：“大刚报曾对中国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作过有益的贡献，因此，大刚报在解放后能获得人民政府的批准，继续出版。”他又指出：“大刚报是少数知识分子同别人结合起来办的一张报纸，这是它同国内其他私营报纸不同的特点。正是这个特点，使大刚报走向了进步，走向了人民。”

这不但是对《大刚报》历史作用的恰如其份的评价，也是对《大刚报》的性质的正确论断。因此，武汉解放后，《大刚报》就成为在党领导下的人民的报纸。在全国各大城市，如京津沪解放后也保留了少数私营报纸，而《大刚报》的发展道路，和其它报纸比较起来，却是不同的。《大刚报》经过了短时间的改造，就宣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1951年底停刊，全体工作人员则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的工作人员。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说明了什么呢？至少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大刚报》是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适应人民的需要，而确定自己的命运的。抗战时期，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要求。解放战争时期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内战的要求。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在完成解放初期的宣传报道任务后，再以原来的面貌担负起全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任务，已经不能适应了。《大刚报》停刊，也正是《大刚报》工作人员的新起点，进一步走向了党报工作者的行列。第二，《大刚报》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的，他们尽管出身经历不同，世界观不同，但他们的为人民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是一致的。在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进行自我改造，终于成为党报工作人员，这是《大刚报》工作人员的光荣。第三，党对《大刚报》的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正因为《大刚报》在历史上为人民作过有益的贡献，起过进步的作用，不管经历多么曲折复杂，党没有忘记它，更没有抛弃它，对它在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党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充分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的一面，谅解它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消极的一面，并且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前进，走向新的起点。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老新闻工作者，坚持了团结和教育的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党的正确的文化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是《大刚报》工作人员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迅速改造和成长为党的机关报的基本队伍的主要力量源泉，而《大刚报》工作人员的自觉努力是加速进步的主观因素。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武汉军管会文教部直接关怀和支持了《大刚报》的继续出版；不久又派来了总编辑张若达同志、编辑朱万年同志和尹慧珉同志等来工作。接着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关怀下成立了党支部。《大刚报》工作人员是努力领会和宣传党的政策，以适应解放初期的新形势的。但是由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在发生剧烈的变革，人民群众的思想水平在迅速提高，《大刚报》在出版一年多后已日益感到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矛盾和新的困难日益深刻地摆在面前，如果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需要，采取新的办法，就很难有出路，那就有办不下去，甚至有被迫停刊的危险。

、主要的矛盾和困难表现为：

版面不适应。《大刚报》汉口版是以全国性大报的架子存在的，以报道国内外政治新闻和地方工商新闻为主，文艺副刊联系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解放后的新闻事业和旧中国时代的反映各派政治势力无政府集团竞争的舆论工具不同，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纳入了党和国家的计划轨道，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网，分工十分明显。社会主义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集体的组织者，是党和政府指导工作的强有力武器，是人民的喉舌。社会主义报纸的党性十分鲜明，社会功能十分明确，读者对报纸的质量要求日益提高，迫切需要从报纸上每天摄取思想、理论、政策、方针、文化、科学等反映新时代的新知识。从党和政府来说，迫切需要迅速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宣传政策方针、指导和推动工作，并迅速反映广大群众中产生的新事物、新经

验、新典型，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当时的《大刚报》对这样的新任务显然是无法胜任的。

领导不适应。大刚报社的领导人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和文化业务素养，有对中国旧社会和国际政治的深刻了解。但是在新形势和新任务面前，他们过去熟悉的一套东西显然是不能适应了，而大量不熟悉的东西却每日每时地展现在面前了。他们面临着一个重新学习的任务。同时，领导干部和中层骨干都太少，不能适应全面、系统地反映和指导武汉地区工作的需要。

干部队伍不适应。大刚报社有一批业务熟悉、文化水平较高的工作人员，但是数量不多。从业务经验来说，过去对旧中国的社会情况比较熟悉，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则是生疏的；过去单纯报道政治和社会动态和工商市场经济，比较得心应手。现在要按社会分工，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反映、指导新建设、新生活，则无论在理论、政策和业务的素质上都明显地不适应，也面临着从头学起的任务。

领导和工作人员，从世界观来说，都需要实现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需要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克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

物质条件不适应。大刚报社原来的底子很薄，只有几台对开平版机，没有自动铸字机和卷筒机，设备陈旧落后，缺字很多。办公用房是租用的民房，低矮简陋，拥挤不堪。工作人员的居住条件极差，集体宿舍里象沙丁鱼一样并列着木板床。

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工作人员十分努力、辛苦，但发行量却不断下降，最低时降到了两千多份。经费十分短缺，尽管政府给了资助，但买新闻纸、发工资仍十分困难，要向

银行借债，向报贩收了零售费才能凑足工资。发到每人手上有时是一大捆零头票子，仍然是吃了上顿愁下顿。社长刘人熙还是象解放前一样，把办公室设在经理部，成天忙着张罗经费和行政事务，实际上无法指导社务。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人民政府经过充分酝酿、反复征求意见后作出决定，通过适当的途径将《大刚报》改造成为党报。第一步先实行公私合营，并在1950年8月26日签订了《大刚报》公私合营的合同。并成立了董事会、监事会，聘请编委会和正副社长、总编辑。

我原在武汉市委政策研究室任副主任，1950年8月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找我谈话，说《大刚报》已实行公私合营，市委决定派我代表党和公方去工作。我说对这个工作很陌生，恐怕做不好。尔重同志说你先考虑一下。过了两天，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对我说，你不要犹豫了，你还是到报社去，而且要快点去。这样我就没有犹豫的余地了。我又到了尔重同志家里，尔重同志进一步谈了对《大刚报》改造的任务，首先要依靠党支部，团结老新闻工作者，从抓好当前宣传报道入手，加强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方针的学习，逐步改造，改变面貌。并要我向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学习，市委当然会加强领导的。我担心报社党员干部太少，一下子难以改变面貌，尔重同志说市委会考虑逐步调配充实。这样我就以党的和公方的代表身份进入大刚报社。摆在面前的任务，一手要抓好当前宣传报道，努力跟上形势，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一手要抓好内部的改造、教育和团结工作，为过渡到党报创造条件。因此工作是十分紧张而复杂的。

二

改造的关键在于做好对人的团结、教育和使用安排的工作，首先是领导集团。对于原《大刚报》的领导人，党采取了区别对待，坚持团结的方针。

刘人熙同志是《大刚报》的社长，在武汉解放前夕，经地下党和地下工作者的争取，他不但保护《大刚报》一起留下来，还做了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的工作。解放后的态度也是积极的，是同党合作的。因此党对他作为上层民主人士来对待。1950年底江西农村实行土改，刘人熙家乡莲花县的农民派代表来武汉城乡联络委员会要求清算刘人熙历史上曾经参加地主武装自卫队向苏维埃区域反攻倒算的罪行。当时武汉市委研究了刘的情况，认为是历史上的一般政治问题，自卫队是地主武装，但不是职业性的，刘也是一般队员。因此决定由市委统战部长周季方出面，指示城乡联络处同江西的同志商量，不带回江西清算，由市公安局拘留审查，向农民交付罚金。征得莲花县农民同意后，由报社借一笔钱给刘交付罚金，公安局则将刘拘留一天，刘写了检查和交代后即行释放回家。市委考虑到这一因素，刘人熙再担任《大刚报》社长是不合适的了，但必须安排适当职务。决定调往中苏友好协会武汉分会担任副秘书长，后又调往政协武汉市委担任委员和副秘书长，直到他去世。在历次政治运动和“文革”中，他也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和冲击。对此刘人熙是满意的。

严问天同志是大刚报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历史上则长期担任《大刚报》的主笔，靠撰写社论为生，纯粹是个老报人。因此党还是重用的，继续留任担任原职务。当然，旧社

会出身的人，在历史上也难免有一什么问题，在报社开展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严问天同志坦率地向党交代了自己历史上一般性问题，从而取得了党的信任。在《大刚报》终刊前都担任原职务，只是到1951年9月市委决定内定《大刚报》为党报后由市委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兼社长，严问天同志才改任副总编辑。在《新武汉报》创刊后以及《长江日报》期间，严问天同志担任总编室主任。以后即使在“左”的指导思想下，在严问天同志一时尚不能入党、在党报工作有困难的情况下，党对他仍然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作了妥善安排。市委决定安排他为政协武汉市委员兼副秘书长，直到去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严问天同志也没有受到如同报社党员干部所受到的那种打击和冲击。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问天同志不幸因病去世前，终于如愿以偿，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黄邦和同志是《大刚报》副总编辑，记者出身，曾担任过采访室主任，有丰富的办报经验和广泛的知识。在武汉解放前的1948年，经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引导，他投奔了中原解放区，在中共江汉区鄂中地委城工部的领导下，返回大刚报社从事地下斗争，做了不少工作。因此党对黄邦和同志一直是作为革命干部对待的，在《大刚报》期间一直担任副总编辑，负责版面发稿工作。在《大刚报》终刊后，在《新武汉报》和《长江日报》期间，由于邦和同志尚未入党，为工作方便之计，改任为总编室主任，仍然负责版面发稿工作。在报社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印刷厂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反对封建把头时，因为黄邦和同志担任过工务主任，有一些工人同志要求对黄邦和开展清算斗争。我们向市委汇报后，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的态度很明确，指出运动是反封建不反知

识分子，因此党保护了邦和同志，说服了工人。后来只是在反胡风斗争转入肃反审干阶段，对邦和同志在中正大学时期的政治历史作了审查，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当时运动矛头并非针对大刚报社的老人，而是全国性运动的影响，党员干部所受冲击和隔离审查的面更大。当运动转入审干后，对邦和同志政治历史作了一般性问题的结论，是实事求是的。

在肃反和审干运动中有一个任务，即要弄清楚大刚报社中的国民党组织的问题，也即是《大刚报》的政治背景问题，以及毛健吾同CC系的关系问题。这在当时的运动是很自然的，是必然要提出的问题。因为报社党组织并不了解《大刚报》汉口版及其人员的全部历史，要求弄清楚是必然的。但在市委领导下，党对《大刚报》问题，并没有如同反胡风那样，作为一个集中的斗争目标来进行，而是通过审查清楚原大刚报社工作人员的历史，在整个过程中来弄清楚。这在当时情况下是十分稳妥的办法了。经过审干，终于弄清楚了毛健吾同CC系的派别斗争的关系，弄清楚了汉口《大刚报》同南京《大刚报》的关系，弄清楚了刘人熙是一般国民党员，在大刚报社内并无国民党组织，也一般地了解了汉口大刚报社在历史上地下党和进步文化人的影响。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如果说整个反胡风、肃反运动确实是错整了好同志，扩大化，但弄清楚了《大刚报》的政治面目，也弄清楚了大刚报社的上层领导干部的政治面目，并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这却又是一件好事。而这个结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当然，对待黄邦和同志的使用是有“左”的影响的，对他的革命历史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因而影响入党，这是他调离报社的一个原因。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欠妥当的。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黄邦和同志才得到妥善安排，他的才能也终于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他的革命历史也得到了承认。

对于《大刚报》的其他编辑、记者、电务、资料 and 经理等人员，一律作为革命干部看待，和以后调入的党员干部一视同仁。这一条原则是始终坚持的。当时报社党员干部较少，因此市委陆续调进一些党员干部，但从数量说，大刚报社原有人马仍占多数。党坚持了知识分子政策，采取团结、教育、放手使用的方针。为了帮助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党的同情者小组，如同党员一样过严格的组织生活，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逐步树立党的观念和组织观念。而在使用上不分党与非党，不分原《大刚报》工作人员和后调入人员，一视同仁。市委并发出通知，各级组织对待《大刚报》的记者要视同党报记者一样，给方便和支持，提供资料和参加一定的会议等。因此《大刚报》工作人员的进步是很快的，尽管有“左”的关门倾向的影响，还是吸收了一些同志入党。

三

对公私合营后《大刚报》的改造目标，则是要建设成为名符其实的党报。主要是向党报学习，向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学习，也向《人民日报》及其他党报学习。但是中心一环则是党要加强报纸的领导，建立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业务上的绝对领导权。

一、中南局宣传部，特别是副部长熊复同志，《长江日报》总编辑陈楚同志，经常关怀、指导《大刚报》的工作。遇

有重要会议或指示，中南局宣传部都通知我去参加，《长江日报》编委会遇有重要活动，有时也通知我去听一听。熊复和陈楚同志还来报社作报告，帮助《大刚报》工作人员提高思想和业务水平。

中共武汉市委对《大刚报》始终抓得很紧，给予经常的关怀和指示。从公私合营之日起，市委常委会的每周例会就通知我列席，从未间断，形成了制度，在会上随时对报纸给以指示。每年至少听取一次报社的汇报，并就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定。宣传部长李尔重同志则几乎每月都要听汇报，或者亲自跑到报社来作指示。没有这样的有力领导，《大刚报》的改造就不会那样顺利。

二、在报社内部则建立集体领导机构——编委会，作为决策机构。最初的编委会有李尔重、陆天虹、曾卓、严问天、黄邦和、朱文尧、尹慧珉、杨坤潮、朱万年、戴易山。因有非党员编委，因此成立党组，成员有李尔重、陆天虹、曾卓、朱文尧、尹慧珉、杨坤潮。另外，为了体现全党办报，编委会还吸收了宣传处长、工会、共青团、妇联的宣传部长为编委。但实际作用不大，不久即取消。

三、大刚报社原来的机构分成为编辑部和经理部两摊子，社长的屁股坐在经理部，是旧报社的架式。编辑部又分为编辑室、采访室、资料室、校对室，好处是采访、编辑及时，但已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编辑部按党报方式适应社会分工的需要，设为：编辑组、政文组、财经组、工业工运组、文艺副刊组、校对组、资料组。经理部改为行政出版处，下设秘书组、财务组、广告发行组、行政组、印刷组。编辑记者分到各组，这就大大加强了同社会各系统的联系，便于深入实际，联系群众。

四

在办报对象上要改变原来以工商界、知识界为主要读者，改变为以工农兵、知识分子及其干部为主要读者，同时也照顾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需要。在办报方针上，《大刚报》汉口版原来是以全国性大报的架子存在的，以政治、工商等动态报道为主，并在上海、北京设有办事处。在公私合营后则应改造为地方性党报，以工农业生产和党的中心工作为主，同时也保留重视政治时事报道的传统。在办报路线上原来主要依靠记者采访，也联系了一部分知识分子作者。公私合营后则更依靠全党依靠群众办报，大力加强群众工作。在采访、编稿原来是凭编辑记者的自由，所谓“无冕之王”的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公私合营后则更以党报的标准，依靠各级党委采访，写稿编稿则要注意思想性、党性和通俗化。总之，在编采通工作中要大大加强党性、地方性、群众性，力求做到三者的统一。这在大刚报社的工作人员来说是个艰巨的改造过程，从本质上来说这关系到每个工作人员的党性锻炼，世界观的改造，群众观点的确立，以及采访作风和编辑作风、工作作风的大转变。

一、改革版面。旧社会的报纸为了经济收入，把大部分篇幅刊登广告，甚至第一版就是广告，新闻报道反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大刚报》也不例外。革新版面是为了使前述办报方针在版面分工上充分体现出来。大体上一版是要闻和中心工作，二版是经济为主的地方新闻，三版为副刊，四版为国际国内新闻。同时压缩广告的版面，但仍保存城市报纸每日刊登广告的传统。改版后的《大刚报》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中心工作占据

了大部分版面，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和创造性劳动上了头版头条的宝座。这就受到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公私合营前，《大刚报》的发行急剧下降，经费难以为继，改版后的《大刚报》发行迅速上升，由二千份猛增到二万份。平版机不够用了，中南局宣传部及时无偿调拨来轮转机，出报时间大大提前了，印刷质量大大提高了。特别可喜的是《大刚报》的发行深入到工厂、商店、机关、学校和街道中去了，拥有大量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干部读者，它的影响作用扩大了，市委、政市府的工作意图，党的方针政策和马列主义思想，通过《大刚报》传播开去，市委对《大刚报》的要求逐步实现。

二、加强工业生产和工农运动的报道。解放初期，城市工作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方针，以生产为中心，加强企业管理，加强工会活动，启发工人的国家主人翁精神，开展劳动竞赛。同时又在基层企业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反对封建把头，搬去压在头上的石头，彻底翻身作主人。这样的报道课题在《大刚报》的编辑记者中还是陌生的，这就涉及到报纸和记者向哪儿扎根的问题。为此专们成立工业工运组，配备了较强较多的记者和编辑，并要求他们深入到工人中去，到工厂、码头去，同工人交朋友，同劳动模范打交道。特别是武汉市第一届劳动模范大会，组织了大规模的报道，劳动模范的形象和事迹在头版头条连续不断地报道。这就轰动了全市，报纸就由工商界的“好朋友”变成了工人阶级的“好朋友”。

三、开展工人通讯员运动。报纸要在工人中扎根，不但通过报道，还要组织一支庞大的工人通讯员队伍，让工人和他们的干部自己来写。这又是一件新鲜事，是《大刚报》历史上没有过的。在市委宣传部的帮助下，在各系统、各大企

业里物色了第一批工人通讯员，不少党政干部也乐于当通讯员。第一次通讯员会议就是在市委机关会议室召开的，以后逐步发展、充实、提高。工人阶级中的第一批通讯员和一批党政干部拿起笔来了，《大刚报》的稿件就源源而来，版面也增加了生气。

四、贯彻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报纸上不但要有工人通讯员的稿件，并且还要直接反映群众的呼声，因此开辟了读者来信专栏，刊登读者来信中有意义、有价值的呼声，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此外，在报纸上公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在党报是有传统的，但在《大刚报》则是新事物。《大刚报》解放前，曾经充分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和黑暗，那是对敌人的揭露。人民的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属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既要敢于批评，又要善于运用这个武器，难度是很大的。但不能因此而却步，市委也支持这种公开的批评。于是《大刚报》上对于严重的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在人民面前称王称霸等少数恶劣作风公开进行批评，有的甚至涉及到高级领导干部。这不但在《大刚报》，而且在武汉人民中也引起震动，耳目一新。盛赞共产党确实是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见惯了国民党的官官相卫的新区人民，对于共产党的这种光明磊落的胸怀，是极鲜明的对照。当然，《大刚报》由于还在学步阶段，在开展批评的领导艺术上，政策界线的掌握上，批评分寸火候的运用上还是有缺点的，有的批评过了头，有的政策掌握得不准确，这是改造的幼年阶段不可避免的缺点。

五、加强言论。言论是报纸的灵魂，《大刚报》解放后一段的言论受到一定的局限性，方向不明，观点不清，是有苦

衷的。公私合营后，市委要求加强言论，代表市委、市政府指导工作，传播党的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并发通知，要求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大刚报》的言论。因此言论的方向明确，观点也就明确了。值得一记的是市委领导带头为《大刚报》写社论或写文章，至于报社领导撰写的社论，市委规定要送审，主要审稿人是李尔重同志。我们记得市委书记张平化、市长吴德峰、宣传部长李尔重都为《大刚报》写过文章或社论。这对于提高《大刚报》的思想性和指导性，起了重要作用，对于培养和提高报社工作人员的水平也作出榜样，发挥了作用。

六、加强政治学习。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和党的政策的学习，是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系统的学习由党支部统一领导，同时通过工会、共青团、党的同情者小组分别组织，联系思想，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学理论学文件和改造思想结合起来，实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在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适时地开展忠诚老实运动，号召向党交心，自觉交代自身的政治历史问题。由于实行了自觉交代、不追不逼的方针，基本上弄清楚了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没有追逼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而受到什么处分，从而增进了团结，增强了党的观念和组织观念，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并做到心情舒畅，调动积极性和进取性。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是成功的。

五

到1951年9月，公私合营一周年，以上各项改造已初见成效。在总结了一年工作的变化后，我向市委作了全面汇报，市委书记张平化同志肯定了改造一年的成绩，市委常委会当即决定，从1951年10月份起，内定《大刚报》